

## 《社会学经典教材译丛》总序

谢立中

一部好的教材,可以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起重要的推进作用。因此,教材建设在每一门现代科学学科的发展过程中都被当作一项核心的任务。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学发展来说,自然也不例外。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之日起,中国的社会学教育工作者就十分重视社会学教材的编写工作。

毋庸置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各个学科中形成一套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与本国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相适应的本土化教材体系,既是教材建设的基本任务和最终目标,也是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但具体到中国社会学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学科来说,不仅在重建以来的20多年时间里,而且在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秀社会学教材都应该是教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如费孝通先生在几年前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仍然处在重建过程之中的学科来说,“中国的社会学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需要用较长的时间来“补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学术发展水平还没有能够与世界先进国家并驾齐驱之前,向发达国家学习始终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

引进发达国家的教材可以有多种形式。从国内的实际情形来看,目前比较常见的形式至少有三种。一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教学需要,从若干国外优秀教材或原著中选择部分章节,在未经翻译的情况下重新改编成一本新教材;二是直接以影印本的形式将国外的优秀教材重新出版;三是将国外优秀的教材翻译成中文出版。前两种形式的优点是将外文著作直接以原文形式呈现给读者,使原作所具有的信息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北京大学出版社才于今年上半年在国内率先推出了一批社会学经典教材的影印本)。但这两种形式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一方面,至少就目前的状况而言,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那样,我国绝大多数教社会学课程的教师以及上这门课的学生,还做不到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因此,以外文原文形式出版的教材所能够产生的影响在范围上就必将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我认为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面),虽然外文本在保留原文信息方面有着自己的长处,但它却永远有着自己致命的一个短处,即它永远是以非汉语的形式存在,因而它永远不能成为汉语文化或汉语学术的一个有机部分。即使在未来,中国读者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了,绝大多数人

都能够“流畅地阅读外文原著”了,情况也是如此。从这一角度来讲,外文著作(包括教材)的汉语译本在推动汉语文化和学术建设方面所具有的地位是外文原文的改编本或影印本所无法取代的。因此,以中译本的形式引进国外优秀的社会学教材就不仅曾经是、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将会是我们引进国外社会学教材的一个主要形式。并且,从这同样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可以说,虽然国内(尤其是近几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国外优秀社会学教材的中译本,但从国内在这方面的需要来看,现有的译本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北京大学出版社在推出了“社会学经典教材影印丛书”之后,又决定再编辑出版一套“社会学经典教材译丛”。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举措。这两套丛书结合起来,必将对我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既需要更好地了解国外先进的文化和学术,与世界“接轨”,也需要不断地推进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和学术。前者是我们融入世界民族大家庭的必要途径,后者则是我们的立身之本。而引进、出版更多的国外优秀教材,正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土文化和学术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可能永远需要用“两条腿”走路:既要推出更多更好的外文原文影印本图书,又要推出更多更好的国外优秀著作的中译本。在这个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既有必要也有可能。